

# 冷战时期中美共同利益特点分析

储新宇

(教育部社科中心,北京 100080)

**摘要:**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实现了解冻、建交与发展。这是中美两国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寻求、发展共同利益的结果。分析这些共同利益,可以归纳出几个特点:在安全领域,共同应对苏联霸权;在经贸领域,往来日益加深,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共同安全利益重于共同经贸利益;因共同利益产生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

**关键词:**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共同利益;特点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080-004

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如同国家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国家双边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也是多层面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实现了解冻、建交与发展。这是中美两国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寻求、发展共同利益的结果。分析这些共同利益,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

## 一、在安全领域,共同应对苏联霸权

自新中国成立到中美双边关系解冻,中美两国一直是冷战格局中明显的冤家,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尖锐对立。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美国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要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声,但在政府层面,似乎还看不到改观的希望。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相对处于战略守势,同时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开始调整其战略思维和政策选择,“尼克松主义”的出笼和相应的政策制定就是最明显表现。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政策选择表现在两个密切联系的方面:第一,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说:“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sup>[1]448</sup>要实现这一目标,“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sup>[1]384</sup>。美国开始要求苏联给予

合作,但苏联以自己对河内的影响极为有限为由给华盛顿碰了个软钉子。之后,一直支援越南、对越南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国实际成为可供美国争取的结束战争的另一大助力。<sup>[2]32-33</sup>第二,着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不仅是美国体面结束越南战争的要求,更是对抗苏联、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正如尼克松所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sup>[3]1</sup>基辛格在1971年10月呈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们想利用中国政策告诉莫斯科,它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得不考虑可能出现的美中合作——所有这些将不至于引起苏联的过分偏执。对苏联的有力影响恐怕正是我们从中国的主动中所获得的最大收益。”<sup>[4]44</sup>所以,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视维护与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更着眼于莫斯科。<sup>[2]51</sup>

尽管尼克松上台后在亚洲战略方面的调整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但在客观上也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带来了改善。第一,越美会谈和美国从1968年11月1日起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sup>[5]42</sup>的确在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安全压力。第二,着手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战略取向在

作者简介:储新宇(1974-),男,安徽潜山人,法学博士,教育部社科中心副教授、副处长,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战略。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不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这就为中美共同利益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战略环境。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力量对比态势的变化不仅直接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亚洲政策的调整,而且也给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取向带来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彻底恶化使得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首先担心的是苏联,而不再是美国,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sup>[6]33</sup>中苏关系的破裂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争取和利用中国提供了可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sup>[7]313</sup>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尽管当时中国决策层对于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偏高,并因此做出了一些过度反应,但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事实和到处扩张的势头,不能不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接近。<sup>[6]29</sup>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说,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既可以抗衡苏联的威胁,也有希望与美国谈判解决台湾和越南战争问题,还有助于中国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sup>[6]26</sup>周恩来在谈到上海联合公报时说:“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sup>[8]110</sup>

可以看出,中美在安全领域中形成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之上的。由于这一利益基础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存在,所以,在这期间,共同安全利益一直是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当然,随着美苏、中苏关系和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共同安全利益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也会相应地上升或下降。

## 二、在经贸领域,往来日益加深、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之间仍有贸易往来(据中国海关统计,1946年美国在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中占57.16%,居各国对华贸易之首。新中国刚成立,受政治上观望态度的影响,中美仍保持贸易关系)<sup>[9]1</sup>,但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选择,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两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与隔

绝。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美在这段时间里根本谈不上共同经贸利益。随着中美政治关系的解冻,经贸关系也开始恢复和回暖,主要标志是1971年6月10日美国白宫公布对华非战略性项目贸易货单,正式结束实行21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运。从此,经贸领域内的共同利益在维系和推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中美关系自1971年解冻以来,经贸关系尽管有一点起伏,但总体上是稳步发展的。20年时间从490万美元上升到200.31亿美元,翻了约6番,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利益需求的结果。这种经贸方面的共同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如1972年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提到:“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sup>[10]484</sup>但当时这段话并没有引起舆论界和政界的关注。随着美苏、中苏关系的缓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共同经贸利益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开始上升。1985年5月30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说,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不再是中美关系“惟一重要的支柱”,两国有相似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些利益已成为广泛和持久的利益,为美中建立官方和稳定关系提供了基础。<sup>[10]177</sup>邓小平也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sup>[11]32</sup>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美国国内贸易赤字的剧增(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贸易逆差剧增,1987年美国第100届国会把平衡贸易赤字作为首要议题)<sup>[9]54</sup>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共同经贸利益将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 三、共同安全利益重于共同经贸利益

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建交以后获得了较快发展,特别是1980年2月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在维系和推动中美关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影响,冷战时期,中美经贸往来受制于安全利益需求。在彼此安全利益需求强烈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两国关系的破坏作用就会下降,即表现为政治关系改善、经贸往来增多;反之就

会上升,政治关系进入低潮、经贸往来减少。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战略态势发生微妙变化,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有所衰退,美国国力开始复苏,美苏力量对比开始向美国倾斜,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的意义下降。同时,198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调整了“一条线”的外交政策,赋予独立自主以真正的不结盟内涵。这就意味着中美在安全领域内的利益需求强度开始下降。按照上述逻辑,安全领域内需求强度的下降就意味着中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将会突显,政治关系随即陷入低潮、经贸往来减少。共和党人里根入主白宫后,在“重振国威”的口号下,在台湾问题上,特别是售台武器问题上不断突破中美已经达成的有关协定。由于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没有丝毫让步。邓小平说:“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sup>[12]377</sup>这样,中美政治关系在共同安全威胁下降的情况下陷入低潮。受其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也随即出现下滑。据美方统计,1981 年中美贸易总额为 56.68 亿美元,但到了 1982 年下降为 54.14 亿美元,1983 年更跌至 46.49 亿美元,比 1980 年的 49.18 亿美元还低。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尽管中美安全利益需求强度有所下降,但在两极格局下,只要苏联还是其中一极,只要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前提还没有得到解决,中美共同安全利益就不会消失。为了维持这一利益需求,中美仍需保证一定程度的政治关系。与此同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种背景下,中美经贸有了长足发展,从 1983 年的 46.49 亿美元增加到 1989 年的 177.95 亿美元。尽管中美经贸领域内的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但在苏联对双方的威胁还没有消失的情况下,我们还很难区分谁重谁轻。换句话说,如果苏联这一共同的威胁消失以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那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共同经贸需求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如果威胁消失后,经贸关系受阻,那只能说明共同经贸利益在中美关系中仍然处于次要矛盾地位,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安全领域内的利益需求仍然是维系和推动中美关系的主动动力。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也随之瓦解。正当人们以为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内的共同利益将取代共同安全利益成为维系、推动中美关系的主动动力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使人们认识到:安全领域内的共同利益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是维系和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

#### 四、因共同利益产生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

在冷战时期,尽管中美在安全和经贸领域都存在共同利益,但综合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双方因共同利益而产生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

第一,在安全领域,中美苏三角关系是不对称的。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安全利益需求使中美关系实现了解冻,并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但在该三角关系中,中国的实力最弱、地位最低。尽管当时中美关系已解冻、中苏还处在对峙状态,但在两极格局下,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把发展同对方的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美国来说,美苏关系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利益,而美中关系涉及到美国的地区利益。<sup>[13]846</sup>所以有学者说,尽管“在整个 70 年代和随后的一个时期,中国始终认为: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共同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应该而且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战略支点。然而,美国人并未真正接受中国提出的这一战略构想。由于在美、苏、中的三角关系中,中国毕竟是最弱小的一极,在中苏、中美和美苏三对关系中,中苏关系又是最紧张的。这就使得美国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既可以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又可以和苏联搞缓和并在军备控制谈判中讨价还价。……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搞平衡外交,中、苏就会都有求于美国,美国就可以较小的代价推进美国的利益”<sup>[14]212-213</sup>。

第二,在经贸领域,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从表 1 可以看出:首先,1971—1990 年,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尽管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绝对量太低,特别是双边贸易量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太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这 20 年的时间里中美经贸关系是不密切的。其次,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美方对中国的依赖性较小,而且在 20 年间变化不大;相反,中方则对美



表1 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分别占两国贸易总额的比例表(1971-1990)

年份	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	年份	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
1971	0.0%	——	1981	1.1%	12.7%
1972	0.1%	——	1982	1.1%	12.7%
1973	0.5%	——	1983	0.9%	10.2%
1974	0.4%	——	1984	1.1%	11.8%
1975	0.2%	——	1985	1.4%	10.9%
1976	0.1%	——	1986	1.3%	10.5%
1977	0.1%	2.5%	1987	1.4%	11.8%
1978	0.3%	5.4%	1988	1.7%	13.2%
1979	0.6%	7.9%	1989	2.1%	16.1%
1980	1.0%	12.7%	1990	2.2%	17.6%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

国的依赖性相对较大,而且越来越深。这就意味着中美在经贸领域内的依赖状况是不对称的。不密切性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内产生的共同利益对于维系和推动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很有限。为了更好地衡量中美经贸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性,可使用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分析工具。“敏感性”是指一方感受到对方变化的速度和程度。<sup>[15]137</sup>很显然,在相互依赖关系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对方的反应。“一般说来,敏感程度与依赖程度成正比。依赖程度越高,越敏感。”<sup>[15]138</sup>联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由于中方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方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在中美依赖关系中中方对美方的敏感程度也远远高于美方对中方的敏感程度。“脆弱性”是指一方对另一方变化的承受和适应能力的强弱,它以应变能力为基础<sup>[15]137-138</sup>,它“涉及到影响一方采取相应措施及其产生的影响,常依受损害的程度而定。由于各方的反应能力不一,它们表现的脆弱性也有差异。一般而言,实力雄厚、调节机制较健全的一方,不会十分脆弱。”<sup>[15]138</sup>联系中美经贸关系,由于中国与美国在综合实力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这就意味着中方对美国变化的承受和适应能力远远高于美方对中国变化的承受和适应能力。

## 参考文献:

- [1]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M].伍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2]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宫力,主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3]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M].裘克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4][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3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 [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6]宫力.邓小平与美国[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 [7]林克,等.历史的真实[M].香港: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
- [8]金冲及.周恩来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9]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1950-200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 [10]刘连第,等.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3]刘金质.冷战史(中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14]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宫力,等,主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5]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吴勇)